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77

中国图书馆 事业史

刘少泉 编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國圖書分類法

中國圖書分類法
第五版

第五版

中國圖書分類法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77

陽中醫學圖書館藏

中国图书馆 事业史

刘少泉 编著



中医学院 0665241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本书据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第 1 版排印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图书馆的起源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图书馆起源的前提条件	(1)
第二节 殷商时期的国家图书馆	(6)
第三节 西周的官府藏书	(15)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	(23)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藏书	(23)
第二节 战国时期的藏书	(27)
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图书馆事业	(34)
第一节 秦朝的藏书与焚书	(34)
第二节 西汉国家藏书体系的建立	(37)
第三节 西汉国家藏书的整理与分类	(42)
第四节 东汉时期的国家藏书事业	(47)
第五节 两汉国家藏书的厄运	(50)
第六节 两汉私家藏书的发展	(51)
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图书馆事业	(55)
第一节 三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	(55)
第二节 两晋时期的图书馆事业	(58)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的图书馆事业	(62)
第五章 汉代至南北朝时期佛道经典的皮藏	(71)
第一节 佛教经典的传入与收藏	(71)
第二节 道教与道书及其皮藏	(79)

第六章	隋唐时期的图书馆事业	(86)
第一节	隋朝的国家藏书事业	(86)
第二节	唐代的国家藏书事业	(91)
第三节	唐代国家藏书事业的特色	(96)
第四节	隋唐时期私家藏书的新发展	(102)
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寺观藏书	(107)
第七章	宋代的图书馆事业	(114)
第一节	北宋崇文院与秘书省的藏书事业	(114)
第二节	北宋皇室系统的殿阁藏书	(125)
第三节	南宋秘书省的藏书事业	(127)
第四节	两宋私家藏书的继续发展	(133)
第五节	宋代书院藏书的开拓	(142)
第六节	宋代佛藏、道藏的刊版与皮藏	(147)
第八章	辽、金、元时期的图书馆事业	(156)
第一节	辽朝的图书馆事业	(156)
第二节	金朝的图书馆事业	(159)
第三节	元朝的国家图书馆事业	(162)
第四节	元朝的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	(168)
第五节	辽、金、元的佛寺和道观藏书	(171)
第九章	明代的图书馆事业	(179)
第一节	明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	(179)
第二节	明代的官府藏书	(182)
第三节	明代的私家藏书	(191)
第四节	明代书院的起伏与刻书、藏书	(200)
第五节	明代《大藏经》、《道藏经》刊印与佛寺道观的皮藏	(202)
第十章	清代前期的图书馆事业	(214)
第一节	清代前期图书馆事业的社会背景	(214)
第二节	清代的“七阁”藏书	(223)
第三节	清代官府的其他藏书处所	(233)
第四节	清代的书院藏书	(239)

第五节	清代的私家藏书	(245)
第六节	孙从添、章学诚	(260)
第十一章	近代的图书馆事业	(272)
第一节	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社会背景	(272)
第二节	近代图书馆观念的引入	(275)
第三节	近代的公共藏书楼	(280)
第四节	辛亥革命前夕的图书馆	(285)
第五节	辛亥革命后图书馆事业的勃兴	(293)
后 记		(303)

第一章 中国古代图书馆起源的前提条件

要追寻我国古代图书馆起源的前提条件,不能不先从文字的发明和图书的产生谈起。因为,有了文字的发明运用,才有产生图书馆的先决条件,有了图书的产生积累,才有设立图书馆的基础前提。

一、文字的发明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人类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文字的发明运用和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周易·系辞下传》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说:古代伏羲氏时,“始书八卦,以垂宪章”;炎帝氏时“始结绳为治,而统万物”;到了黄帝时,发明仓颉“始作书契,以别类,始分理之可制者也,始造书契”,才有了文字。这样的叙述不一定可靠,但也给我们提供了汉字产生的一条线索。

黄帝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 2600 余年。古代学者一般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始祖,所以,往往把一切发明创造都归于他。据专家们考证,黄帝、仓颉等人的传说,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稍后,属于仰韶文化。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河南濮阳西水坡、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山东泰安大汶口、莒县、诸城等地遗址中,都有发现

第一章 中国古代图书馆的起源

第一节 中国古代图书馆起源的前提条件

要追寻我国古代图书馆的起源,不能不先从文字的发明和图书的产生谈起。因为,有了文字的发明运用,才有产生图书的先决条件,有了图书的产生积累,才有设立图书馆的物质前提。

一、文字的发明

文字是纪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人类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文字的发明运用和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周易·系辞下传》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叙》说:古代庖羲氏时,“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到了黄帝时,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别异也,初造书契”,才有了文字。这些记载虽不一定可靠,但也给我们提供了汉字产生的一条线索。

黄帝的时期,大约在公元前 2600 余年。古代学者一般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所以,往往把一切文物制度都溯源于他。据专家们考证,黄帝、仓颉等人的活动,基本上与大汶口文化时期相当,属于仰韶文化。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陕西长安灵台、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山东泰安大汶口、莒县、诸城等地遗址中,都曾发现

有刻画在陶器上的一些符号。这些符号,经过考证,确认是我国最原始的简单文字。郭沫若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以为这可以以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以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又说:“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①。于省吾认为:“西安半坡村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陶器口缘外往往刻画简单的文字……这种简单的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仰韶文化距今约有六千余年,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时期也就有六千多年之久。”^②这些考据说明仰韶时期已出现了原始文字。“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百工以义(治),万品以察”(《说文叙》),说明黄帝时代出现了“百工”和“万品”,社会生活变得复杂,于是产生了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运用文字简单记事的“初造书契”。不过,文字形成的本身,是经过千百次尝试和长期演变的过程,从实物(如结绳)记事到图画记事,从图画定型发展到象形文字,从“象形”有了读音,逐渐走向“形声”,便发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文字,进而加强了符号性、系统性和统一性,增强了表音、表义的特征。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代代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我国先民共同创造的结果,绝不会是某一个人的创发。所谓仓颉“初创文字”,不妨理解为他对原始文字有过搜集、整理之功,对汉字的发展和成熟有过较大的贡献。这一点,古人早有明确认识。《荀子·解蔽篇》卷十五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唐人杨倞注:“仓颉,黄帝史官,言古亦有好书者,不如仓颉,一于其道,异术不能乱之,故独传也。”

汉字产生的确切年代尚未考定,但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验证,可以推断,至迟在公元前两千多年仰韶文化的黄帝时代,汉字业已形成。汉字形成之后,又经过相当长的发展历程,而趋于成熟。许多记载表明,夏代文字已有较大发展,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

现的陶文可以看作是证据。在殷代故墟成批发掘出来的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和器物铭文,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成熟的最古的成批汉字,共有4500个左右,其中已考释出近2000个。尚不认识的多是人名、地名和族名等。这批汉字的结构已从独体趋向合体,并有相当数量的形声字。这说明当时汉字已成为记录汉语的成文文字。恩格斯说:“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③显然,汉字的产生及其应用是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有了汉字,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记录下来,传播开去,从而脱离史前状态,进入有史时期,走向文明时代,并成为中国古代图书起源的先决条件。

二、图书的产生

中国图书渊源于成文的记录和档案。所谓成文,即合集众字,规范记录事物以成篇章,或者说,从应用原始的成型“形声”文字记事,进入到已形成能记录文献的成体系的文字篇章。我国成文记事的历史始于何时?据郭沫若考证:“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已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④于省吾根据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进一步考证认为“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商人先公的二示——夏代末期”。^⑤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载录《库》1506武丁时的刻辞,记载了一个贵族十二世祖先的私名,这个私人家族谱牒与商代王室自二示至武丁为十三世的谱系在时间上大致相同。因此,目前学者一般认为,我国成文的历史始于夏末商初。换句话说,我国有成文历史之期,便是中国图书产生之时。就其发展过程来说,自文字创造后,即用以刻字在各式各样的物质材料上,既可以传至远方,也可留于后世。人们通过这些文字载体则可了解彼时彼地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文字记载就这样从最初使用来弥补生活实践中的语言的不足,加强记忆传播,促进彼此思想感情的交流,逐渐成为传播经验(知识)的媒介了。当

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文字成篇成章地记录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以便日后稽考时,这已经是正规的记录和档案了。而当别人或后人利用这种记录和档案时,便能从中汲取经验,获得知识。这已经初具图书的性质。到了人们开始在实践中自觉地使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经验,阐述自己的思想,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构成以知识为中心的载体,并使之传播久远,影响他人的时候,真正的图书便出现了。然而,真正的图书却是记录和档案的发展、深化和进步。因此,可以说,图书起源于记录和档案,而记录和档案又不能与图书完全划等号。

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来考察,我国夏商时代已有典籍。班固在《汉书·叙传下》曾断言:“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魏征等编的《隋书·经籍志》也曾指出:“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古代流传下来的《尚书》中的若干记载更明确具体地反映出夏商之世已有典籍。如《五子之歌》记述夏太康执政时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传云:“典谓经籍,则谓法则。”又如《多士》记载周公的话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传云:“册,书;典,籍。”非常清楚,上古之册、典,就是当代书册典籍,也就是那时的图书。除了文献的记载,出土的实物也验证了这一点。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亦屡有“册”和“典”二字出现。“册”字,如《中》1483 和《乙》1712 甲骨片的“𠔁”,又如《前》7、12、4 片的“𠔁”与《甲》237 片的“𠔁”及《存》1、375 片的“𠔁”,其札一长一短,长短参差,册形象两道绳编连的简册书籍。故《说文》称:“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典”字,如《前》4、43 甲骨片上的“𠔁”,象征着把书册庄重地放在几架上,故《说文》解释:“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以上说明至迟在商代已经产生了典籍(图书)。

典籍的产生主要是由史官所为。自从国家产生以后,文字就被统治者所独占。统治者为统治人民,必须积累经验,于是相应地逐步地建立了一种史官制度。史官的基本职责是“掌书以赞治”(《周礼·天官冢宰》),故对帝王的言行,“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对于这种情形,班固早有深刻的概括,他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⑥这表明上古史官是负责记录帝王的言行和记载王朝的政治、军事事件及撰写发布王朝命令文告的。他们的这些记录和文书所构成的档案,也可以说就是那时史官们所制作的史料性图书(典籍)。

夏商时代所制作的图书,由于受载体的限制,数量不多,且笨重简单。据考证,主要是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石头的书及竹木简策等形式的图书。除竹木简策是推断外,其余几种材料的文字记载已从出土的殷商或更早一些时期的实物得到证明。

当我们认识到了图书的产生后,还应该注意,初期图书与后世图书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图书与档案的性质、关系上。记录和档案的目的主要是作为处理事情的参考和借鉴,它与后世以知识为中心,以教育为目的而传播思想,总结经验,著书立说的图书不同。从这个意义说,初期出现的文字典籍仍属于档案性质的东西。但从它能传授统治经验,提供统治者借鉴的角度上讲,也未尝不可将它看成是图书,或说成是史料性图书。所以,历来人们常把上古时代的记录、档案和书籍统称之为图书(档案)。也因为如此,我们把上古档案作为图书的起源。有了图书,发生了藏书事业,即产生了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清代刘光汉《论中国宜建藏书楼》一文中考述说:“稽之《戴礼》,则古代书在上庠,有典书之官,以诏国子之读书。(《文王世子篇》)典为五帝之书,从册在丌上。《许氏说文》释之曰,尊阁之也。又以丌字象荐物之形,解畀字为约在阁上。《徐氏系传》曰,典,《尚书》所谓大训

在东序,阁所以承物。据此以观,则仓史造字之时,加册于丌,足证初有书契,早已建阁珍藏。”^⑦由此可知,书契尚且如此宝藏,何况典籍(图书)特别重要,怎能不庋藏高阁以示尊崇呢!所以,可以说,中国典藏图书的起源甚为古远。只不过,上古之图书是作为察民布政之用而统于王官,设官典掌的,故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一开始就是国家经营的——即国家图书(档案)馆事业。

第二节 殷商时期的国家图书馆

一、甲骨文的藏所与设备

中国古代图书馆,渊源于图书的储积,追本溯源,当以商代后期殷王朝的国家图书馆为嚆矢。考古发掘证明,今河南安阳西北郊洹河两岸,是殷商王朝的故都。在故都中心小屯村,有许多个布局浑然一体的甲骨穴窖建筑群,尚井然有序地储积着大量的甲骨书籍。从庋藏的甲骨文书来看,是自公元前14世纪末盘庚迁都于殷,至公元前12世纪前半叶帝辛(纣王)亡国,共八世十二王,历时约270年的文字记录。这些甲骨文典藏于此,且有固定的穴窖处所,可以说,这集藏处所就是殷商时期所设置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国家图书(档案)馆。

据记载,自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以来,先后发现了穴窖数百处,仅前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至1937年的15次发掘,就发现了穴窖613处,其中穴窖与殷代文物有关者,计八次,有数以百计的甲骨窖穴群。学者苏莹辉曾根据安阳殷墟发掘报告等文章推断殷代的国家藏书是在这些穴窖中。他在《从考古学上的发现论图书馆起源》里记叙1936年的发掘说:

民国25年3月18日至6月24日,发掘地区:小屯村北地。

这一次集中发掘旧分的 B、C 两区,开了五十三个坑位,挖掘面积约 5200 平方公尺。掘得完好无缺的储藏甲骨文字窖藏一所,坑为圆形,径约 2 公尺,深约 1 公尺余,满贮龟甲。此一坑中有完整的龟腹甲 200 余版,编号共为 17804 片。就原坑未经扰乱及数量之多言,实打破甲骨文字出土以来最高纪录。其中采用朱、墨书写的文字,刻划卜兆之法,皆为甲骨学上重要发现。^⑧

这一发现是很说明问题的。前面说过,小屯村是殷都的中心区域,有完好无缺的储藏甲骨文的穴窖一所,量多、质高、保管好,似为殷商国家图书馆的特藏书库,也犹如后世藏书于秘阁中。又如 1973 年,在小屯南地发现有一处密集的 64 个穴窖,堆放着质地优良的卜用甲骨 4795 片,其中刻辞甲骨 2836 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 276)。因此,我们可以说殷墟发现的大量“居穴”与“窆窖”,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与图书、档案有关的。假定“居穴”是住人的,“窆窖”是藏物的,那末,有一部分的“窆窖”可能是储藏册籍、档案的处所,也就相当于今日之书库。同时,一部分的“居穴”,可能是殷王室官员调阅档案或参考资料的地方,也就相当于今日的参考室或阅览室。我们如再进一步的推测,“窖”有脚窝可以上下,“穴”有台阶可以出入,这岂不是为了提取图书或调阅档案的方便而设计的么?

不难想见,殷墟这批成群的甲骨“穴窖”,是殷王朝有意识、有计划设置的国家图书(档案)馆,或者说,是殷王朝继承发展前世藏室而逐步形成的国家藏书处所。正如陈梦家所分析的:“安阳出土刻辞甲骨,我们现在可以已可断定其年代的,有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七世九王的卜辞。这些都是连续的王朝,它们之间有相连续不变的体例,也有每一王朝新兴的体例。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某些事物发展的过程,也可看出某些新生事件”,^⑨从而进一步说明殷都这些储积或累积甲骨文之穴窖,可能就是当时的图书(档案)馆址。

二、甲骨典籍的内容和形式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十余万片。所谓“甲骨典籍”，是通行于商代的文字刻在当时的龟甲和兽骨上，因以得名的甲骨文。又称“刻辞”、“契文”、“卜辞”、“龟甲文字”、“殷墟文字”或“甲骨的书”等。在这些甲骨文中，又分卜辞甲骨和记事甲骨文两种。前者是大量的，后者仅有少数。它们的内容都很丰富，形式别具特色。

就甲骨典籍的内容而言，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关于甲骨文的内容，甲骨学家曾从阶级关系、生产发展、科学文化等几方面着眼，将其分成四大类二十二小类。这二十二小类是：“①奴隶和平民；②奴隶主贵族；③官吏；④军队，刑罚，监狱；⑤战争；⑥方域；⑦贡纳；⑧农业；⑨渔猎，畜牧；⑩手工业；⑪商业，交通；⑫天文，历法；⑬气象；⑭建筑；⑮疾病；⑯生育；⑰鬼神；⑱祭祀；⑲吉凶，梦幻；⑳卜法；㉑文字；㉒其他”。^⑩这些甲骨文的内容分类虽多，但因卜辞主要是殷商王室的卜辞。故卜辞内容是具有以当时帝王为中心的特点的。它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又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思想和愿望，如国境的安全，年成的丰足，人生的逸乐、疾病以及对祖先的自然神祇的祭祀与祈祷等。

一篇完整的卜辞，通常包括前辞（记卜之日及卜人名字），命辞（即命龟之辞），占辞（即因兆而定吉凶）和验辞（即既卜之后，记录应验之事实）四部分。如武丁卜辞《菁华》二：①癸巳卜壳贞；②旬亡祸；③王占曰**𠄎**其**姪**来；④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姪**自西**𠄎**告曰方士**𠄎**于我东**𠄎**田。这个卜辞共5句话，41字，包括了一篇完整卜辞的内容，是相当典型的。因为卜辞一般都有辞句比较固定，字数不长的特点。但也有例外，特别是某些记事卜辞更是如此。如《菁》3.5“癸丑卜争贞”至“才敦”，系正反两面相接的武丁卜辞，全辞在90字上下；又如《甲》2416和《卜通》592，是有关征

伐孟方、人方的乙、辛卜辞，皆在 50 字以上。至于记事记言的甲骨典册，那更是例外了。

除大多数占卜的刻辞外，也有一些有关占卜或非占卜的记言记事刻辞。它们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卜事刻辞。这类刻辞，一般在卜辞之后，常附征验之辞，这征验之辞本身便是史实的记载。如王卜某日是否降雨，通常便是“某日不雨”；如王占有凶，亦随记灾祸的来临。显然，这是卜辞的一部分的记事文。二是单纯的史实记事刻辞。这类刻辞，如《乙》8653，甲申，王至于三岁、兄四兄；《甲》3913，乙酉，小臣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殷墟出土的骨文中，有几件用兽骨刻制成简牍来记载殷人狩猎、战争史实的。据钱存训说：“目前所知，最少有二根完整和一些破碎的骨简，正面刻有装饰花纹和填以绿松石的文字。加拿大皇家博物馆藏有一根虎骨，约长 22 公分，载 22 字，文曰：‘辛酉，王田于鸡录，只大彘虎。在十月，佳王三祀日。’大意是说，辛酉日，帝辛出猎于鸡麓，捕获了一只猛虎，三年（公元前 1152 年）三月祭于天（图版三、甲）”。另一根“长 28 公分的兽骨，完整的骨上有日期：‘五月，佳木六祀。’即帝辛六年（公元前 1149 年）。还有公元前十二世纪前半叶的残骨简，记有一段战争史实。此骨简全长应为 20 公分，宽 5 公分，现仅存原物的三分之一。刻辞分为五行，共 56 字。大意为征伐西土某些方国，俘获而族 1570 人，车二辆，盾 180 个，衣甲 15 副，箭若干只。第五行末文未毕，应该还有第六行。估计原文应有 160 字以上。在这骨简背后，有一干支表”。^⑩三是非占卜的表谱刻辞。这类刻辞又可分为干支表，如《燕》165，《下》1·5，《缀》314；祀谱，如《粹》113, 114；家谱，如《库》1506，《燕》209，《乙》4856，帚妥子曰，等等。

就甲骨典籍的形式而言，也有显著的特点。一方面每片甲骨有一定的规制。刻辞龟甲有腹甲、背甲和修整过的背甲三种。腹

甲通常是用整片的。背甲则因背脊中央突起而锯成两半。据记载,龟腹甲的长度自14公分至45公分,宽度约7公分至35公分不等。一般长28公分,宽20公分,厚0.6至0.7公分者。最为常见。半背甲的长度27公分至35公分,宽11公分至15公分不等,而以小者为常见。经过修整的背甲甚少,其长度约12公分至16公分,宽度5公分至6公分。至于刻辞的兽骨,有牛骨、羊骨、鹿骨等,其中尤以采用牛骨为多,而选用牛的肩胛骨则是普遍的,同时,也取用肩窝骨、肋骨、头骨。对于甲骨的制作方法,是先除去龟骨上的胶质物,然后在甲骨反面有规律地钻成一个个圆孔,孔旁再凿一些梭形凹槽。如用作贞卜,便由卜人用火灼烫,使甲骨凹槽、圆洞外面呈现横直、粗细、长短的裂纹来判断吉凶。最后,由祭师或史官把占卜的时间、卜人名字、卜问事情及占卜结果、应验等用文字书写契刻在卜兆的附近,成为一个完整的甲骨文。其文字排列的顺序,竖行由上而下,横行则从左至右,与现今的书写格式没有多大差异。

另一方面,甲骨文片是编制成册的。上面说到的甲骨上凿有圆孔,那圆孔可能就是用作甲骨与甲骨之间相连贯的穿孔,以便将甲骨文编制成册。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里,曾提到在殷墟发现刻有“编六”、“册六”、“三册”等字样的龟版,且有穿孔,很可能当时就已经把若干龟片、骨片串连编制成册了。甲骨学者认为,殷墟甲骨一般以六片为一组,所称一组,实为一册,即是最好的说明。这在古籍《逸周书·史记解》里,就有“龟册是从”的话,《韩非子·饰邪篇》也说:“凿龟数策(策一册)”。因此,我们把殷商典藏的这些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甲骨文称之为甲骨书册。殷墟典藏出土的甲骨书册,是非常珍贵的。现绝大部分分别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博物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以及香港等地;有少部分则流藏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西德、苏联、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南朝鲜等